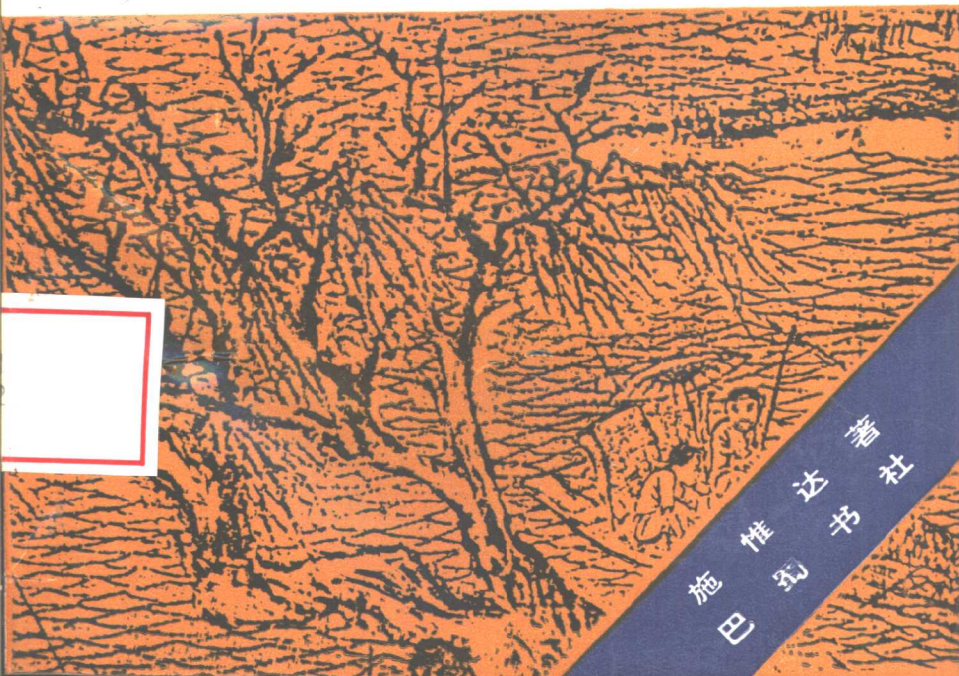




裂变的光芒

——魏晋南北朝文化与文艺美学



施惟达 著
巴蜀书社

裂变的光芒

——魏晋南北朝文化与文艺美学

● 施 惟 达 著 ●



巴蜀书社

1995·成都

责任编辑：周田青

封面设计：李文金

裂变的光芒

——魏晋南北朝文化与文艺美学

施维达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5.875 插页1 字数100千

1995年8月第一版

199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册

ISBN7—80523—589—9/I·232 定价：8.00 元

《裂变的光芒》序

张文勋

大约是五六年前吧？我在和一批年轻学者平日相处和交谈中，产生了一个念头，想把这批有志于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并且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的青年组织起来，在志同道合的前提下，编写一套《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艺美学丛书》。这个想法很快得到这批年轻人的赞同，并且得到巴蜀书社邓南等同志的鼓励和大力支持。后来我们专就这套丛书的编写召开过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二十余人，而且都已定了选题。时隔不久，就已完成五部书稿，作者有四川大学的曹顺庆、暨南大学的蒋述卓、云南大学的施惟达、张国庆、何明等。但由于出版界的种种困难，丛书竟未能实现，虽然这是十分遗憾的事，但是，毕竟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蒋述卓的《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一书，已转到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另外施惟达的《裂变的光芒》等三部书稿，也将于年内在巴蜀书社出版，这还是值得高兴的。在这几部书即将问世之际，施惟达要我为他的书稿写序，我藉此机会，简单地回顾一下书稿写作的缘起。

三年前，我曾为“丛书”拟了一篇序，说明我们计划编写这套丛书的宗旨，现在摘抄几段，倒还可以作为施惟达这部书的序文：

近几年来，不少西方美学理论传播到我国，其中又特别以现代西方美学流派的理论最时新。接受一些外来的东西，开阔我们的眼界，丰富我们的知识。培养我们的审美能力，这自然是没有什么不好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年轻同志对西方的东西盲目崇拜，未经很好研究和消化，只凭一知半解大作文章，满纸新名词、洋术语，不知着到何处？而对祖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则不容分说，一笔抹煞，甚至罗列罪状，大加挞伐。似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数千年间所创造的光辉灿烂文化，都变成阻碍我们前进的包袱。

然而，我们只要稍微理智地想一想，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的产物，总是有精华糟粕之分。优秀的文化，总是经得住时间长河的淘洗，成为一种不可磨灭的民族优秀传统，积淀于民族精神深处。中华民族的文化，几千年来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也不断自我扬弃；优秀的东西逐渐形成灿烂中华的文化传统，而落后的东西，则总会被历史所淘汰。发扬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作为中国人，离开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侈谈全盘西化，这不仅是脱离实际的空想，也有悖于爱国主义和民族感情。

以文艺美学而言，我国自周秦以来，就已形成我们自己的传统，表现在审美观念、审美心理、审美趣味……等等方

面，都有我们的民族特色。我国古代文艺美学中经常使用的一些概念，诸如言志缘情、风骨神韵、豪放婉约、阳刚阴柔、神形兼备等等，都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要了解其内容实质，当然我们可以用西方美学概念作为参照系数，进行比较研究。但是，企图用西方的美学概念去比附甚至代替他们，那是徒劳的。我们只有从我国悠久的深层文化背景中，去寻求我国古代文艺美学产生和形成的原因，才能理解它在我国民族心理、民族精神中所具有的不可被代替的地位。传统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我们古代文艺美学和整个文化背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比较直接的则是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等思想意识领域。其中，又特别是儒家、道家和佛家学说的影响最大。三家学说有明显的不同，甚至是有对立的一面，因此，长期以来它们之间有矛盾斗争。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它们之间也有相通的一面，还有互补的一面。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它们不断互相渗透，融合，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我国古代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虽然在外表上可能各立门户，宗儒崇佛，各有所趋，但在他们的哲学思想或文艺美学思想中，却往往是兼收并蓄，形成自己的思想和美学体系。魏晋玄学、宋元理学、明清哲学……无不如此；而文艺美学中的虚静养气、风骨情采、情志性灵、格调神韵、意境境界……等等，也无不如此。而所有这些我国古代特有的美学概念，又都是深层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们饱含着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民族心理、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虽然，我们今天已处于崭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方式

产生新的观念，也产生新的审美意识；但是无可否认，传统的优秀文化和审美意识，也在潜移默化中融注于我们的新文化新观念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因此，把我国古代文艺美学放在整个文化大背景下加以考察，用历史的眼光去加以研究，从而发掘出其中的精华，使之发扬光大，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美学服务，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惟达的《裂变的光芒——魏晋南北朝文化与文艺美学》，就是在上述指导思想下写成的。作者以自己的独有的思辩能力和美学见解，选择了新的视角去审视魏晋南北朝文化与文艺美学的关系，所以对于大家所熟悉的一些文艺现象作了新的阐释，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使魏晋南北朝文艺美学的研究视野更开阔了，理论探索也深化了。由于作者把这一时期的文艺美学放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去作整体透视，所以对这时期美学的新变、审美观念的形成，文艺美学的发达，都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同时，作者把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上升到美学的高度作了理论的概括，提出一些富有新意的见解，其中如：“神思——创造的美学”、“气韵——生命的美学”、“风格——个性的美学”等等，都在较高的层面上揭示出我国文学史上这一历史时期的文艺美学的本质特征，可以看出其深层的文化积淀。这些见解，是根据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观念的进一步的明确和审美观念的新变而概括出来的，所以见解新而有说服力，把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惟达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美学，向来不满足于字面的诠释和个别概念的解说，而是注意对理论的发掘和整体的把握。因此，对一些重要的古代美学专有名词概念，如“神思”、“体性”、“风骨”、“气韵”等等，能够从理论上开掘其美学内涵。这样，也有助于读者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使我国古代文艺美学为现代人所接受，使我们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当然，任何理论的开掘和整体的把握，又必须建立在深入细致的研究基础之上，名词概念的诠释，作家作品的分别研究都是必备的功夫。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既尊重我国古代文艺美学自身固有的含义，发掘出其自身所有的理论内涵，而不至于产生望文生义、任意发挥之嫌。惟达在写这本书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他特别重视资料的征引和对原意的把握。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希望惟达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还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功夫。

惟达的文风，深入浅出，概念清楚，文字流畅，明白易懂，使得本书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强的可读性，我想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

1993、8、12、于云南大学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璀璨的审美世界.....	1
洛神赋：美的追寻——山水·人物：美的发现	
——文学艺术：美的创造.....	1
第二章 裂变与开放的时代.....	25
天变道亦变——多重文化撞击与融合——价值观	
念的转换.....	25
第三章 神思：创造的美学.....	48
神思飞扬——神思与创造——“神”兮归来.....	48
第四章 气韵：生命的美学.....	67
从哲学到美学——气韵生动——养气与审美.....	67
第五章 缘情：情感的美学.....	86
言志的衰落与缘情的兴起——圣人有情及其美学	
伸展——绮靡之风.....	86
第六章 风格：个性的美学.....	104
个性的张扬——概念的演进——艺术风格的融铸	104

第七章 品藻：鉴赏的美学	123
新的姿态——滋味与六观：不同的模式——圆照 之象，务先博观.....	123
第八章 物色：自然的美学	142
天人合一：永恒的理想——物色：美的奥府—— 山水诗：回归自然.....	142
第九章 文体：规范的美学	160
规范的倾向——百家腾跃，终入环内——历史的 清理与批评.....	160
后记	177

第一章 璀璨的审美世界

洛神赋：美的追寻

从公元220年曹魏王朝正式建立，三国时期开始，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掉南朝陈重新统一中国，凡369年，中间经历了魏（蜀、吴）；晋（西晋、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北朝十六国、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等若干先后相继或并列的朝代，史称魏晋南北朝。也可以再往前推到曹操迫汉献帝建都许昌、改年号建安的公元196年算起。本书所述，就是包括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安时代在内的。

这确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特殊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社会混乱、王朝更迭有如走马灯一样，与汉代相比，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社会风尚、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文艺美学说，我国古代的文艺美学正是在这一时期正式形成并获得空前的繁荣。而理论的繁荣却是植根于时代对美的前所未有的热情和执着，植根于文学艺术创作自身的独立和发展。这种对美的自

觉追寻，以曹植所塑造的洛神为其象征，揭开序幕。

魏文帝黄初四年，即曹操病死，曹丕称帝的第四年，陈思王曹植在洛水之滨，写下了传世名篇《洛神赋》。诗人以无限爱慕，描绘了这位洛神之神的绝世美姿，万种风情，捕捉那恍兮惚兮，若往若复的美的存在。虽然最终因人神之道殊，未得与神女结为伉俪，然诗人却留着永远的向往与思恋。“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浮长川而忘反，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

关于这首赋的写作，历代有不同说法，形成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桩迷案。归纳起来，大致分为两种：感甄说与寄心君王说。甄氏原为袁绍子袁熙之妃，以貌美著名。据说曹操大破袁绍后，曹植曾求为妻，但被曹操赐给了曹丕。后来甄后为郭后所谗而死，因托梦于植，倾诉衷肠，曹植遂感而作此赋。寄心君王说则认为，“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以作此赋，託词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①此说以曹植受文帝曹丕猜忌的史实为根据，以屈原的《离骚》为模式，推断诗人以宓妃自况，向乃兄表忠心。感甄说哀婉动人，富有浓厚的浪漫色彩，非常容易为人接受，但细加推敲，则于事实不合。寄心君王说似乎有道理，然却难以在作品中觅到寄心君王的蛛丝马迹，不似《离骚》有直接向楚王表白的句子，硬要牵强为之，则破坏了洛神这个完整自足的

① 何焯：《义门读书记》。

审美意象。

对于这宗迷案，近来张文勋教授有新的阐释，简而言之曰：“苦闷的象征”。张先生认为，洛神是理想的象征，这理想，可以是美的理想，爱的理想，也可能是事业的理想，生活的理想。曹植藉这篇赋以寄托自己的种种失意情怀^①。这一见解是颇中肯綮的。读一部文学作品，若要太拘泥于具体的事件或遭遇，实而不能虚，则会失却作品所蕴含的许多艺术意味。尤其在抒情艺术中，历史事实提供的，是一种创作或欣赏的氛围、背景，只有在把握这种氛围、背景的基础上，集中于对作品本身的体验，才会有更真切的感触、更丰富的联想、更深邃的意蕴。张先生把《洛神赋》看作是曹植理想破灭的苦闷象征，的确是准确地揭示了作品的深层命意。沿着这个思路再往前走一步，我们看到，曹植的苦闷，不独是他个人的苦闷；曹植的理想，不独是他个人的理想；曹植的追求，不独是他个人的追求；在分离动荡，灾祸四伏，疾疫肆虐的年代，曹植的情感思绪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诗人所塑造的洛神，象征着时代对美的憧憬与渴求，它昭示人们一个理想的审美世界。此后的数百年间，一方面是破碎裂变的现实，一方面人们却沉浸于对美的追寻之中，酿成所谓“六朝金粉”的华丽岁月。

诚然，在古代文学史上，并非是曹植首创出一位美神的形象。楚宋玉就作过著名的《神女赋》，“既婉孌于幽静

① 张文勋：《苦闷的象征——〈洛神赋〉新议》。见《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

兮，又婆娑乎人间”的神女，“欢情未接，将辞而去”，令楚王“回肠伤气，颠倒失据。……惆怅垂涕，求之至曙。”再早，屈原《九歌》里就有《山鬼》一篇，“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神秘而美艳的山中女神，洋溢着楚文化的浪漫气息。洛神的诞生，显而易见是受到屈、宋的影响。但是，只有到了魏晋南北朝，人们对美的追求才如此自觉而执着，这其中确乎孕含着一个历史的嬗变。这一时代里，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崇尚文学艺术，热衷于审美游乐，与世之迥异形成鲜明反差。

从曹操开始，横槊赋诗，对酒当歌，武略中充满文采，曹丕常以风流自赏，兴之所至，辄书写一篇作品送人，更不用说天分极高的曹植了。他不仅有豪爽任侠、渴望建功立业的一面，同时有“不及世事，但美遨游”^①的一面。曹植喜欢作诗论文，游乐饮宴，而且精通音乐，擅长舞蹈。相传我国最早的佛教音乐《梵呗乐》即为曹植根据印度梵曲所创。他的“胡舞王椎锻”、“跳丸击剑”等节目表演得十分出色，曾有“天人”之誉。在曹氏父子的提倡鼓励下，产生了彬彬之盛的邺下文人集团，君臣酬唱，“行则连舆，止则接席”^②，为后世所仰。

晋代继踵，颇不乏文。在所谓“五胡乱华”的北中国，很有几位以文才著称的君主。如清代学者赵翼指出的：“晋

①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平原侯植·序》

② 曹丕：《与吴质书》

载记诸僭伪之君，虽非中国人，亦多有文学。”^①撇开赵翼的传统偏见，他确实指出了时代尚文的事实。他列举了汉赵帝国的刘渊、刘聪、刘曜父子，燕帝国的慕容俊、慕容宝，前秦帝国的苻坚，后秦帝国的姚泓等。其中如“刘聪幼而聪悟，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刘曜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亦善属文，工草隶。”而博学多才艺的苻坚——这位淝水之战的失败者，常宴集群臣，奏乐赋诗，他治下的前秦确实出现过若干年歌舞升平的清晏盛世。

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尚且如此，衣冠南渡、偏安江左的东晋帝国，浮华之风更盛。从葛洪在《抱朴子》中的描绘可见一斑：“礼教渐颓，故让莫崇，傲慢成俗。俦类饮会，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盛务唯在樗蒲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樗蒲、弹棋是古代博戏，比之汉代儒生的循规蹈矩，不苟言笑，人们更趣尚自由随意的游乐，声色之美的享受。由于对美的重视，此时甚至出现了时装的流行，人们竞相追逐时髦，打扮自己。“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飭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皆半额也。”^②这种时代风气，或许并不亚于我们今天。

①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八。

② 《抱朴子·讥惑》

再看南朝。南朝历宋、齐、梁、陈四代，总共不过169年，都是一些短命王朝。梁最长，不过55年，陈最短，才32年。然而除战乱外，其间却颇出现几段繁华之时。如宋文帝时，“人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齐武帝时，“十许年中，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袿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①“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②终魏晋南北朝，战乱血腥、时疾瘟疫与安定发展、沉醉华靡，交织演奏出炫人心魄的双重旋律，呈示着美神那飘忽而难以抗拒的诱惑。

山水·人物：美的发现

法国艺术家罗丹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魏晋后，当人们的目光转向对美的追寻时，确乎在世界上发现了前所未见的美。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值得骄傲的审美大发现时期。山水、人物、艺术首次摆脱了功利实用或道德教化的模式，以纯粹的审美形态、自足的精神意蕴闯入人

① 《南史·循吏传》

② 《颜氏家训·勉学》

们的视域，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审美认识和审美感知。

遨游之风的兴盛是与人们对自然山水之美的发现同步的。其始似乎可追溯至曹氏兄弟及邨下文人集团。曹丕《与吴质书》曾回忆当年的情景：“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而其《芙蓉池作》就是这样一首游览诗：

“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鲜。……”

夜间行游，意在搜寻自然间别一样的美。而此时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是悠悠的渠水，郁郁的高树，忽然掠过的夜风，惊而离树的飞鸟，更有天空的星月闪耀、云霞飘舞，好一个五色相喧的美丽世界。这又是一个真实的自然，完全不似汉赋中所铺排出的那个堆砌并带有神灵色彩的自然。由此可以说明，此时人们真正开始在游乐中欣赏自然，发现自然之美。这逐渐游漫成一种时代风气。

魏正始年间，以阮籍、嵇康为首的名士常饮酒酣畅于竹林之中，虽没有直接歌咏竹林之美，但坐中佳士，左右修竹，二者已经在精神和形式上溶为一体了。时人美之，称为“竹林七贤”。自此竹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了特定的审美含意，清通，脱俗，成为士大夫卓尔不群的象征。西晋元康年间，潘岳、石崇等一般文人时流趋附于权臣贾谧门下，被目为“文章二十四友”。他们集于石崇的金谷别庐，作乐饮